

566

上海三联学术文库
SHANGHAI SANLIAN XUESHU WENKU

[英] 齐格蒙特·鲍曼 / 著
Zygmunt Bauman / Author
欧阳景根 / 译

C/1
B3/7

流动的 现代性

LIQUID MODERNITY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动的现代性 / (英) 鲍曼著; 欧阳景根译—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2.

(上海三联学术文库)

ISBN 7-5426-1630-7

I. 流… II. ①鲍…②欧… III. 社会学

VI. 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8265 号

流动的现代性

著 者/[英]齐格蒙特·鲍曼

译 者/欧阳景根

策 划/吴士余

责任编辑/刘宏伟

装帧设计/范娇青

责任制作/钱震华

责任校对/王有钧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0235)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 sanlianc@online.sh.cn

印 刷/上海市印刷十厂

版 次/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230 千字

印 张/11

印 数/1-3100

ISBN 7-5426-1630-7

C·20 定价 22.00 元

目 录

前 言 论轻灵和流动	1
------------------	---

第一章 解放	23
--------------	----

解放——复杂的幸事·批判的偶然性和批判的变化的身份·与公民作斗争的个体·个体化社会中批判理论的困境·批判理论再论·生活政治批判

第二章 个体性	81
---------------	----

资本主义——沉重的和轻灵的·有汽车,就能旅行·不要告诉我;做给我看·被迫行为变成了上瘾行为·消费者的身体·作为驱逐妖魔仪式的购物·自由购物—和它看起来的差不多·分裂了,我们就去购物

第三章 时间/空间	141
-----------------	-----

当陌生人遇上陌生人·禁绝之地,吞噬之地,乌有之乡和

2 流动的现代性

虚幻空间·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作为时间历史的现代性·从沉重的现代性到轻快的现代性·诱人的轻巧性质·短暂的生存

第四章 劳动 203

发展进步和信任历史·劳动的兴衰荣辱·从结合到共处·
附论:延迟的短暂发展史·不稳定世界的人的结合关系·不信任的自我存续·

第五章 共同体..... 261

民族主义,标志2·团结——通过相似性还是通过差异性? 代价高昂的安全稳定性·民族国家之后·填补真空·衣帽间式的共同体

补 论:论写作和写作社会学..... 315

索 引 339

前 言

——论轻灵和流动

突然中断、前后矛盾和出其不意，是我们生活中的普遍情况。对许多人来说，这些东西甚至已经成了他们的现实需求，除了突然变卦和接连更换自己的刺激物之外，他们的想法不再得到满足……我们不再能够承受任何具有持续性的事物。我们也不再明白如何使厌倦乏味去产生出结果。

所以整个问题就落到这样的地步：人类思想是否能控制人类思想所产生的成就？

保罗·瓦累利(Paul Valery)

“流动性”(fluidity)是液体和气体的特性。正如《大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权威性的解释告诉我们的，液体和气体区别于固体的，是“当液体和气体处于静止状态时，它们不能承受外来的剪应力或切应力的作用”，因而“在

2 流动的现代性

受到这样一种外力的作用时,它们在外形上会处于一种连续的变化状态”。

物质的一部分在受到剪应力作用时,它相对于其他一部分而言,这种连续的、不可复原的变化状态,形成一种流体特有的流动状态。相反,如果对固体内部施加一种外来的剪应力,就会导致一种弯曲或折曲状态,如果保持这种作用力,这个固体并不会流动,而且会恢复它的原初状态。

液体——流体的一种形态,具有这种显著的特征,是因为,“它们的分子是有序排列的,而且分子的直径微乎其微”;而“固体截然不同的表现,是它的原子聚合类型和原子结构排列的直接结果”。反过来,“聚合”这一术语表明固体的稳定性,它们能“阻碍对原子的分离”。《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就谈到这里。我列出此书对“流体”的解释,就是要用这一词语,来比喻“现代”这一时间范畴的“现在”这一阶段。

流体的所有这些特征,简单的说就是,液体不像固体,能够容易地控制和保持它们的外在形状。流体,可以说,既没有固定的空间外形,也没有时间上的持久性。而固体有着明确的空间维度,但是,它能使外在作用力无效,并因而降低外在作用力的意义。在时间意义上(从有效地阻碍它的流动或者使流动无关紧要的意义上说),流体不能长久地保持它的任何形状,相反,它是易于连续地改变它的形状的;对流体来讲,正是它时间上的流动(即时间维度),比它占据的空间(即空间维度)更为重要:占据某一空间,毕竟只是“短暂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固体没有时间意义;相反,对液体来讲,具有价值的

主要是时间维度。我们在描述固体时,人们可以忽略它的时间;而在描述流体时,不考虑它的时间维度将是悲惨的错误。对流体的描述都是片刻和简单的印象,因而在画面的底部需要添加一个日期。

流体轻易地流动着。它们或“流动”、或“溢出”、或“泼洒”、或“溅落”、或“倾泻”、或“渗漏”、或“涌流”、或“喷射”、或“滴落”、或“渗出”、或“渗流”,千姿百态,不一而足;不像固体,它们的运动不易停止——对前面的障碍物,它们或绕过、或溶解,对静止的物体,它们打开一个缺口,渗透着前进。在遭遇固体时,它们不受损害,而固体在遭遇流体时,如果固体还保持着固体的形态,它们却会发生改变,被浸透并潮湿不堪。流体非凡的流动性,使人把它们和“轻松”的思想联系在一起。有许多液体,按密度算,要重于固体,尽管如此,但我们往往倾向于将它们直观化,认为它们比任何固体都更轻。我们把“轻”或“不重”与流动性和多变性联系在一起;根据实践经验,我们知道,更轻的物体,我们更能够将它移动,并且移动得更快。

“现在”是现代性历史中的一个阶段,我们希望抓住它在许多方面体现出来的“新奇”这一实质。上面这些,就是用流动性来对它进行合适类比的充分理由。

我承认,对于每一个熟悉“现代性话语”(modernity discourse)、熟悉这一常常用来解说现代历史的专业词汇的人来说,这一主张会使他们大吃一惊、略作停顿。难道现代性不是一个从起点就已开始的“液化”(liquefaction)的进程吗?难

4 流动的現代性

道“溶解液体中的固形物”(melting the solids)^①,不一直是它的主要的消遣方式和首要的成就吗?换言之,从现代性的萌芽时期起,难道它不一直是“流动性的”吗?

这些和其他类似的反对观点是有道理的。一百五十年前,《共产党宣言》的作者创造出了“瓦解传统”这一词语。当时,他们创造这一词语,是指完全自信、生气勃勃的现代精神看待当时的社会时作出的描述,这一描述是:社会按它的习惯方式止步不前,社会的风格过于死气沉沉,而要转变和重塑社会目标,又会遭到过多的社会抵制。一旦我们回想起“瓦解传统”这一著名的生造的词语,我们的理由就会更加充分。现实应该从自己历史的“死亡之手”(dead hand)中解放出来,而且这种解放,只有通过瓦解传统(这也就是说,要破坏那些持续了较长时间的、藐视时间推移或不受时间流逝影响的任何东西)的方式才能实现,这一点是决定性的因素。在这一意义上,如果说“精神”是“现代的”,那精神确实是现代的。这种目的和意图反过来要求“亵渎神明”:那就是否认和放弃过去,而且首要的是否认“传统”——即,现在仍然保留下来的过去的积淀和残余;因而,这又要求粉碎那些允许传统抵制“液化”(即抵制对传统的消解和变革——译者注)进程、对传统起保护作用的信仰和忠诚。

^① Solids 原意是指液体中的固形物。根据上下文的关系,这里是用流体和液化来比喻现代性及其作用,同时用液体中的固形物来比喻现代性中僵死、停滞的传统性和阻碍社会前进的障碍物,用抵制液化(即抵制对固形物的消解)来比喻其对现代性及对变革的抵制。因此,在后面的译文中,我一般把原文中“固形物”(the solids)和“溶解固形物”意译成传统和瓦解传统。——译注

然而，我们有必要记住，将要做的这一切，并不是要一次性地、一劳永逸地清除传统，并使英勇无畏的新世界永远摆脱它们，而只是要为更新的、更加完善、先进的传统清扫场所；是要用另外一套更为完美先进的传统，来取代原有的残缺不全、弊端重重的传统。同时，由于替代者的完美性新的传统将是不可变更的。当人们读到托克维尔的《旧秩序》（*Ancien Regime*）一书时，会发现此书的观点是：因为“牢不可破”的旧传统早已变得陈旧不堪、反应迟钝，而且既不可靠又行将就木，所以它是招人怨恨、应该受到谴责的，同时，它还应该被标上“加以毁灭”的记号。在这一意义上，人们可能会对此书感到特别惊奇。当今时代为前现代传统障碍的崩溃和解体打下了基础；而且，在瓦解传统的动力背后，其中一个最强有力的目的是，人们渴望去发掘和创造新的传统——以使之改变旧的传统——一个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坚实的崭新的传统，这样人们就能有所依靠，有所信任，并凭借这一新的传统来使得世界变得可以预料，并因而可以控制和管理。

我们要瓦解的第一种传统和要“褻渎”的第一个“神明”，是传统忠诚，是束缚人们手脚、阻碍人们前进和约束人们进取心的习俗性的权利和义务。人们要迫切地着手建构新秩序（确切地说，是新的传统），就必须摆脱旧秩序加压在新秩序创建者身上的枷锁和负担。“瓦解”传统意味着首要的任务是，摆脱挡在人们通往效益理性计算道路前面的障碍——即毫无意义、毫不相干的义务和责任。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要将企业家的动力，从家常义务和严密的道德责任体系的羁绊

和桎梏中解放出来；或者，如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所说的，仅仅保留构成人们相互关系和相互责任基础的诸多联系纽带中的“货币关系”(cash - nexus)纽带。这种对传统的瓦解使得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失灵——即，既让它空洞无物、失去保护，又让它失去武装、暴露在外，从而没有能力去反抗企业促成的行动准则和企业塑造的理性标准，更不用说去和它们分庭抗礼、平分秋色了。

瓦解传统的这一决定性的开始，使得传统这一领域为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或者(就像卡尔·马克思所阐释的那样)为经济这一关键性角色进入并占据支配地位(如韦伯所说的)大开方便之门：现在，社会生活的“基础”，为其他所有的生活领域创造了一个“超级结构”(superstructure)——即，这样一个典型的时代产物，它的唯一的功就是为社会的连续和平稳的运行服务。传统的瓦解导致经济更加摆脱了传统政治的、伦理的和文化的阻碍。它积淀出了一个新秩序，一个首先按经济标准来界定的新秩序。这一新秩序比它所取代的旧秩序，更为“坚不可摧”，因为它不像旧秩序，它能防止非经济行为对它的挑战。大多数能向新秩序施加压力、具有颠覆或改变新秩序能力的政治或道德力量，已经破碎不堪，或者说力量已经变得过于弱小，不足以完成这样一件艰巨的任务。我并不是说，经济秩序一旦建立起来，就会移植到社会生活的其他部分，使其他领域的社会生活再次受到教育，并让它们皈依到经济伦理的“佛门”之下；说经济秩序开始控制人类生活的全局，是因为，不管在其他的生活领域里发生了何种情况，就经济秩序唯一关注的连绵不绝、持续不断的再生产来讲，它

都是毫无意义、不起作用的。

克劳斯·奥菲(Claus Offe)对现代性历程的这一阶段有过很好的描绘(Claus Offe, *The Utopia of the Zero Option*, Praxis International, 1987):“正是要合乎规范地去影响和使秩序获得新生(对旧秩序的更新)这一努力,也就是说,正是这一试图对旧秩序发挥影响并加以更新的进程中要求具备的协调性,由于它们事实上的无效和根本性的缺陷,而实际上被扼杀了,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复杂的社会已经变得固执僵化起来。”然而,旧秩序内自由多变的“子系统”(subsystems)可能个个变得孤军奋战、各自为营,将它们缠结在一起的方式已经变得日益僵化、奄奄一息,而且与任何形式的选择自由相隔绝了。总体秩序已经失去了选择的机会,选择机会存在的前景远不明朗,在社会生活不可能孕育出选择机会的情况下,想象如何去造就出一个明显可行的选择更是天方夜谭。在总体秩序和它的每一个组成部分之间,在总体秩序和有目的的行动手段和策略之间,存在着一条裂谷——一条将永远扩大,但在其上又见不到任何桥梁的裂谷。

与多数反面乌托邦^①的设想相反,既没有因独裁、屈服、镇压和奴役而导致一败涂地的结果;也没有因总体秩序内私域的“扩张”(colonization)而引发出一塌糊涂的结局。结果恰恰相反:人们,或正确或错误地,对现实中存在着的那些限制个人行动和选择自由的枷锁和束缚,正在迅猛地被加以清除,

^① 指想象的政治、经济情况一团漆黑的地方,与理想状态的乌托邦形成对比。——译注

表示怀疑。秩序的可靠和坚固,是人类自由力量的典型产物和结晶。这种坚固和可靠是“松开闸门”(releasing the brakes)的总的结果:是解除管制、自由化、灵活化、弹性化的结果,是增长的流动性和放开金融、房地产和劳动力市场的结果,是减轻税收的结果(这是奥菲在“*Binding, Shackles, Brakes, 1987*”一书中所说的);或者(引用理查德·塞纳特 Richard Sennett, *Flesh and Stone* 书中的一句话),是技术的速度、扩散和顺从的结果——换言之,是技术允许制度和它的自由的行动者实行快速分离、允许它们相互回避(而不是正面遭遇)的结果。如果说系统性的、彻底的革命的时间已经过去,那是因为,革命者没有任何可以建立他们的秩序的空间,也没有任何可以攻击的对象;还因为,要想象革命的胜利者一旦建立了自己的新秩序(如果他们是第一个建立自己秩序的群体)能做些什么,来掀翻改变局面并结束那些促使他们造反的痛苦,这有着极度的困难,而且是完全不可能的。将会使参加革命的人变得非常匮乏,因为这类革命党人把改变个人状况的渴望,说成是一项改变社会秩序的工程。因此,对这种人员匮乏的状况,人们几乎能完全予以理解。

建构一个全新的、更加完美的秩序,以取代弊端重重的旧秩序的这一任务,当前还没有提上日程——至少在认为革命的政治行动应该存在的层次上说,这一任务还没有提上日程。“瓦解传统”这一现代性的永恒特征,因此获得了新的内涵,而且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它重新指向了一个新的目标——目标重新定位的最大意义在于瓦解对方力量,这一力量的瓦解,会使得秩序和制度的问题提上政治日程。

此时,传统和旧秩序命运发生转变,自己被扔进“熔炉”,在当今流动的現代性的时代里接受熔解的考验。旧秩序成了将个人在集体行动中的个人选择——即人们的沟通模式,和在个人表现的生活政策与人类集体的政治行动之间的协调,连锁在一起的枷锁。

乌里奇·贝克(Ulrich Beck)前几年发明了“第二现代性”(Second Modernity)这一名词,来指“现代性自己改变自己”(turning upon itself)的阶段——即所谓的“现代性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 of modernity)阶段。1999年2月3日,他在对乔内森·卢瑟福(Jonathan Rutherford)的一次访谈中,提到了“虽死犹存”(dead and still alive)的“还魂尸类型”的传统(Zombie categories)和“还魂尸似的制度”(Zombie institutions)这样两个概念^①。他把家庭、阶层和邻居关系,当成是这种新现象最突出的例子。比如说,家庭:

问问你自己,在今天,家庭究竟是什么?它是什么意思?当然,家庭里有孩子,有我的孩子,我们的孩子。但是,甚至是家长身份,作为家庭生活的核心,在离婚的情况下也将面临解体……祖父母不参与儿女问题上的任何决策,他们既包含在家庭之内又排除在家庭之外。从孙辈的角度考虑,祖父母的含义取决于个人的决定和选择。

这也就是说,当前出现的问题,是一个现代性的“融化能力”的

^① *Zombie*,在英文里是指神话中能使尸体起死回生的魔力,或是指还魂尸。在此书中,作者是要指虽死犹存的传统和旧秩序。——译注

再分配和再定位的问题。它们首先影响到尚存(没有毁灭)的制度,影响到那些用来限定行动选择范围的既定的秩序,比如不为法律认可的世袭财产的分配。旧有的结构、格局、依附和互动的模式统统被扔进熔炉中去,以得到重新铸造和型塑;这就是天生要打破边界、毁灭一切、具有侵犯色彩的现代性历史中的“砸碎旧框架、旧模型”的阶段。然而,至于个人,它们可以解释说,它们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存在;这样,社会个体遇到的却是和过去一样生硬僵化、难以对付的“更新更完善的”模式和框架。

确实,如果没有别的模式和框架来取代,那么任何模式都不能打破;人们从旧笼子里被放出来,只受到警告和责备,以防通过他们自己持续了一生的努力和奋斗,他们还不能在新秩序里重新找到现成的属于自己的位置:对社会阶层而言,它的框架概括了生活的总体状况和生活的总体前景,并决定了现实生活计划和生活策略的范围。享有自由的社会个体面临的任务是,运用他们新的自由去寻找合适的位置,并根据服从的原则,在那安定下来:在那个位置上,衷心地服从、遵守,被认为是正确的、合适的行为规则和行为方式。

这些模式、规范和准则,是人们能够遵守的对象,是人们能够选择并作为稳定的确定方向的依据,是人们能够接下来得到指引的准绳。正是这些模式、规范和准则,现在正变得日益缺乏起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当代人只能根据自己的想象和决心来指引自己,也不意味着我们当代人能够自由地、胡乱地、随心所欲地建立自己的生活模式。或者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创造物质财富和设计蓝图的时候,不再依赖

于社会。但相反,它意味着,我们正从一个前设的(pre-allocated)的“参考群体”(reference groups)时代走向一个“普遍观照”(universal comparison)^①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个人自力更生的目标不是已知的、预先假定的,并在这些个人奋斗真正取得成功——即实现个体生活的目标——之前,这些目标要经历太多的、深刻的变化,但是要解释为什么会是这些目标,又会显得特别的牵强。

这一时代的模式和框架,不再是“已知的、假定的”,更不用说“不证自明的”;在这些模式和框架里,它们中有许多是相互冲突的,戒律之间相互矛盾,每条戒律都被剥除了许多强制性的、约束性的力量。而且它们的特征都已改变,因而都已依每条戒律的任务情况按条目重新分类。这些戒律不是先于生活政治(life-politics)而存在并塑造生活政治的话语框架,相反,这些戒律是生活政治的结果,是生活政治的转变,塑造和重新塑造了这些戒律。“液化”的力量已经从“制度”转移到了“社会”,从政治转移到了“生活政治”——或者说,已经从社会共处(social cohabitation)的宏观层次转移到了微观层次。

因此,我们对现代性的看法,就是一种个体化的、私人化

^① “参考群体”,这是一个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术语,它是指个人乐于成为其成员而往往又难以加入的群体,个人的态度形成受此群体的规范支配。在这个时代,人们的目标和态度依据的是特定群体的准则。与此相反,“普遍观照”是指个人目标的制定,依据的是周围的个人或人群的状况和处境,人们在制定目标时,首先观照他人的情况。周围人的处境和状况是变动不居的,因此,在这个时代,人们的目标也会经历很多大的变化。——译注

的观点,编造模式的重担和失败的责任,都首先落在了个体的肩上。依附和互动模式的转变——即“液化”——已经开始。这种模式在今天具有可塑性,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的先辈们没有亲历过这些模式,对它也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像所有的流体一样,这些模式不能长期地保持它们的形态。塑造它们的形状比保持它们的形状更为容易。固体是一次定型,并且一劳永逸。保持流体的形状要求长期予以密切注意,同时保持警惕,并付出持久的努力——甚至这种努力的成功也只是一个太早的结论。“流动的”现代性的到来,已经改变了人类的状况,否认甚至贬低这种深刻的变化都是草率的。系统性结构的遥不可及,伴随着生活政治非结构化的、流动的状态这一直接背景,以一种激进的方式改变了人类的状况,并且要求我们重新思考那些在对人类状况进行宏大叙事时起构架作用的旧概念。像还魂尸一样,这些概念虽死犹存。尽管它以一种新的形态或者换个化身出现,现在,现实性的问题是,这些概念是否行得通;或者——如果行不通,我们又如何去给它安排一个体面、有效的葬礼。

本书要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有五个基本概念,有助于覆盖人类状况的正统叙事过程,我们把它们挑选出来进行检视。这五个概念是:解放、个体性、时间/空间、劳动、共同体。我们抱着将“孩子”从喷涌而出的肮脏不堪的“洗澡水”中救出的希望,对这些概念的意义和用途进行过探究,尽管是以一种非常零碎的、原始的方式。

现代性的意义非常丰富,借助许多不同的标识,我们可以追踪它的实现和随后的进展。然而,现代生活和现代背景有一

个非常突出的特点,这一突出特点也许是“差异产生差异”(difference makes difference);也许是它们的所有其他的特性都源于它的关键特性。这一关键特性是空间和时间之间的变动关系。

当时间和空间从生活实践中分离出来,当它们彼此分离,并且易于从理论上解释为个别的、相互独立的行为类型和策略类型时,现代性就出现了。当它们不是如此,就像它们在前现代的漫长岁月里一样,生活经历各个相互缠结并因此几乎难以区分的方面,就会以一种稳定的、明显牢不可破的一一对应关系连接在一起。在现代性中,时间具有历史,这是因为它的时间承载能力(carrying capacity)在永恒扩张——即空间(空间是时间单位允许经过、穿过、覆盖或者占领的东西)上的延伸。一旦穿过空间的运动速度(它不像明显的不容变更的空间,既不能延长,也不能缩短)成了人类智慧、想象力和应变能力的体现,时间也就获得了历史。

正是关于速度(更明确地说,是加速)的这种观点,当它指的是时间和空间之间的关系时,它就假定了这种关系的可变性。如果这种关系不可改变,如果它是一种非人类的、前人类的现实的属性,而不是人类创造力和决心的体现,如果它没有远远超出自然的运动工具——人腿和马腿(它限制了前现代生命体的运动)——运动的狭窄范围,那么这种关系就没有任何意义。一旦这一经历了一个时间单位的距离开始依赖于技术,要借助人造的运输手段,所有现存的、遗留的对运动速度的限制,原则上都可以超越。只要太空仍然制约了人类的运动,但是,正如日后将要发生的光速运动,为了达